

浅议近现代人物类展览中展品说明文字的撰写

——以“为新中国奋斗——宋庆龄文物文献特展”为例

牛李佳

(宋庆龄陵园管理处 上海 200336)

内容提要:展品说明文字是观众获得展品信息的重要渠道,其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观众对展览内容的接受和理解。这种影响在近现代人物类展览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本文以“为新中国奋斗——宋庆龄文物文献特展”的内容策划工作实践为基础,对近现代人物类展览中展品说明文字的撰写方法进行分析研究,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应对办法,以期能对人物类展览的策展人员有所启发,提升博物馆的内容策划水平。

关键词:博物馆;陈列展览;人物类展览;展品说明文字

博物馆界早已意识到只侧重收藏、研究等内部职能的机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只有将内部职能扩展到外部职能,博物馆的工作才是完整的。因此,他们逐渐将目光聚焦于教育普及与公共服务等外部职能的发挥,在做好收藏、研究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外开展主题展览、社会教育等活动。^①展览作为博物馆向社会公众输出的最主要的文化产品,其质量直接影响到公众对博物馆的评价与印象。

好的展览离不开专业的内容策划。展品说明文字的撰写是展览内容策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展品的信息首先会通过说明文字传达给观众。因此,若想让已脱离其历史背景、各自孤立的文物在既定的主题和逻辑框架下讲好自己的故事,策展人员必须在展品说明文字撰写上下功夫,要用简短精练的语言尽可能有效地做好展品信息的传达。

本文以“为新中国奋斗——宋庆龄文物文献特展”(以下简称“为新中国奋斗展”)的内容策划工作

实践为基础,探讨近现代人物类展览展品说明文字撰写过程中常见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希望能对其他同类展览的内容策划人员有所帮助。

一、近现代人物类展览的概念界定与特点

“人物类展览是指以展示一个著名人物生平事迹及其贡献和精神风范为内容的展览。”^②近现代人物类展览作为人物类展览的一个分支,并没有明确的定义。本文之所以将近现代人物类展览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其在事迹和精神展示方面具有鲜明的个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相关支撑材料多为原始资料

在近现代人物类展览前期所收集的资料中,原始资料占比相当可观。这里所说的原始资料是指展览中的人物所撰写的文章和著作,以及所发出的信

^① 陆建松:《博物馆展览策划:理念与务实》,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第5页。

^② 陆建松:《博物馆展览策划:理念与务实》,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第16页。

函和声明等未经旁人加工过的资料。这些原始资料与展览中的人物有着直接、必然的联系,可信度非常高,既可以作为展品讲述人物的经历和贡献,也可以作为重要依据突出展览的主题和重点,在人物的形象塑造、精神面貌表现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以“为新中国奋斗展”为例,该展览的主标题来源于宋庆龄的个人文集《为新中国奋斗》,三个二级标题也均突出了“奋斗”二字。展览通过宋庆龄的个人文集《为新中国奋斗》、宋庆龄创办的《中国建设》创刊号等原始资料,全面展示了她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以及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所作的独特贡献。

(二) 文献与照片类展品占比较大

文献与照片类展品占比较大是人物类展览区别于自然科学类展览、艺术类展览以及历史类展览的一大特点。既不同于标本、化石等自然文物,也不同于陶瓷、玉器等器物类文物,文献类展品虽然已经脱离了当时的历史环境,但其本身就是历史文化的真实记录,包含了大量的文化信息。在展览中,往往通过一件文献类展品便足以说明人物在某方面或某特定事件中的经历与贡献。照片是真实记录某一历史时刻的图像资料,具有形象逼真、一目了然的特点,是记录和研究历史本来面目的重要依据。

(三) 展览具有较强的政治性

近现代人物类展览中的很多人物均为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作出过突出贡献,他们的生命轨迹与党和国家的发展历程相互交融,他们的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党和国家的形象。近现代人物类展览的举办既是为了纪念过去,也是为了服务当下和未来,此类展览的展期一般是党和国家的重要纪念日或展览人物的诞辰日、逝世纪念日,因此,展览的政治性比较强。

二、近现代人物类展览展品说明文字撰写应注意的问题

近现代人物类展览的特点决定了其展品说明文字撰写的特殊性。本文以“为新中国奋斗展”为例,分析近现代人物类展览展品说明文字撰写应注意的

问题。

(一) 确保基本信息的准确性

确保文化内容输出的准确性是博物馆在相关学术领域保持权威性的基础,严谨的研究成果不仅是博物馆的重要标志,也是博物馆履行其公共服务职责不可或缺的要害。^① 不同于历史类、艺术类和自然科技类展览,人物类展览的展品说明文字中会出现大量人名、地名、日期等信息。这些信息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动,极易出现错误。因此,策展人员必须对这些信息严加考证,以确保其准确性。

首先,要确保展品说明文字中人名的准确性。一方面,要避免误写人名,如“为新中国奋斗展”的策展人员在撰写日本外务省档案《孙文动向》的说明文字时,曾将“宋蔼龄”误写为“宋霭龄”,这种情况是必须要避免的。另一方面,要注意人物的排列顺序,尤其是在撰写照片类展品的说明文字时,要注意说明文字中人名的排列顺序与照片中人物所处位置的对应关系,切忌出现图文不符的情况。例如,图1这张“七君子”与救国会领导人马相伯及爱国实业家杜重远的合影,最初的说明词为:

被救出狱的“七君子”(右起:李公朴、王造时、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章乃器、沙千里)与救国会领导人马相伯(坐着)以及爱国实业家杜重远(右一)合影。

观众很可能在看到第一个括号里的说明文字时就开始将括号中的人名与图片中的人物对号入座,这极易导致观众误将马相伯看作是“七君子”之一。此外,杜重远也并非图片中排在“右一”的人物,而是排在左边第一位的人物。为了确保说明文字的准确性,策展人员最终将这张合影的说明文字修改为:

被救出狱的“七君子”与救国会领导人马相伯以及爱国实业家杜重远合影(右起:李公朴、王造时、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章乃器、沙千里、杜重远)。

其次,要确保展览说明文字中地名的准确性。一地不同名的情况并不罕见,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期地名变更频繁,因此,展馆工作人员应在充分考证的基础上确定某一历史时期某地的准确名称。例如,“为新中国奋斗展”中有一张宋庆龄等人为孙中山

^① 美国博物馆协会编《博物馆教育与学习》,外文出版社,2014,第20页。



图1 “七君子”与救国会领导人马相伯及爱国实业家杜重远的合影

守灵的照片,陈列大纲初稿中对其的说明词为:“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平逝世。”经查,北京改称北平是在1928年至1949年这一时段^①,所以陈列大纲中应将“北平”改为“北京”。

最后,展馆工作人员还需要注意展览中日期的准确性。与历史人物、事件相关的日期是说明文字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相比历史类、艺术类等展览中的日期表述,人物类展览中对日期的表述要更加精确,经常需要具体到“某月”甚至具体到“某日”,所以极易产生错误。历史照片的日期更易出错,除了极少数标注日期的照片外,历史照片本身一般不会携带时间信息,因而需要相关人员从其他资料中查阅考证以获取照片对应的准确日期。如“为新中国奋斗展”的第二部分有一张宋庆龄视察云南的照片(图2),笔者最初查阅的图册上注明,该照片为1956年2月宋庆龄出访印度等国回国后,在昆明停留并视察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所摄。^②但有人指出,宋庆龄于1956年2月出访归来,从仰光飞抵昆明已是4日下午,第二天就从昆明起飞前往北京了^③,从时间上来看宋庆龄不可能穿插视察工作。宋庆龄在回到北京后,于1956年2月18日所作《视察云南省工作的报告》中也写道,“我由于出国访问印度、缅甸、巴基斯坦,这一次在云南省和昆明市只做了六天的视察工作。自十一月二十八日开始至十二月三日止……”^④文中完全没有提及2月飞抵昆明后还进行

了视察一事,因此,可推断出这张视察云南的照片不是拍摄于1956年,而是摄于1955年底。



图2 1955年底宋庆龄视察云南

(二) 提高说明文字的可读性

“一个展览,不管它在历史文化资源的利用上多么成功,无论其展品选择是多么精到,也不论其叙述与再现多么准确,如果不能激发观众的兴趣,不能挽留观众的脚步和视线,那么一切都将变得没有意义。”^⑤展馆工作人员在撰写展品说明环节应坚守的底线是保证说明文字的准确性,而在传播文物知识环节则应保证说明文字的可读性。这里所说的可读性不仅指语言的通俗易懂,还包括文字与主题的相关度、文物信息传递的有效性等。

前文提到,展品中文献占较大比例是近现代人物类展览的特征之一。从“为新中国奋斗展”来看,展览的120余件实物展品中,文献类展品有70余件,占展品总数的一半以上。文献展品包含的信息量较大,在撰写说明文字时,展馆工作人员需要对文献中的信息进行筛选和提炼,以使说明文字紧扣展

① 嘉言:《“北京”、“北平”切莫混用》,《中国编辑》2004年第4期。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故居编《纪念宋庆龄同志》,文物出版社,1982。

③ 尚明轩:《宋庆龄年谱长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921页。

④ 宋庆龄:《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第187页。

⑤ 严建强:《从展示评估出发:专家判断与观众判断的双重实现》,《中国博物馆》2008年第2期。

览主题。

“为新中国奋斗展”第一单元的展品中有孙中山编著的《实业计划》一书,在编写说明文字时,展馆工作人员并没有重点介绍书籍本身的内容,而是将宋庆龄与这本书的关系,特别是将孙中山在宋庆龄的大力协助下完成该书的过程作为说明重点,充分地体现了文献展品与展览主题的关系。展览中还有一件文献展品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著的《西行漫记》。这本书介绍了他在陕北苏区的采访见闻。此书并非宋庆龄所著,没有相关知识背景的观众很难将其与宋庆龄联系起来。但事实上,埃德加·斯诺是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去往陕北的,此书也是斯诺专门赠送给宋庆龄表示感谢的,扉页上还有他的手迹:“送给勇敢的革命家庆龄同志,你是中国第一位鼓励我写作此书的人,而且是此书的第一位读者。对书中的不妥之处请见谅。斯诺。”^①展馆将《西行漫记》放在这一部分展示是为了突出宋庆龄在增强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认可度、为中国共产党争取国际支持等方面所作的贡献。展览中《西行漫记》的说明词以“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埃德加·斯诺成为第一位进入陕北苏区采访的西方记者”开头,与这一板块的展览主题高度契合,也能更好地帮助观众了解宋庆龄。

“为新中国奋斗展”展品中包含大量宋庆龄撰写的书籍、文章、声明等,这类文献是展览的重点,但是纸制文献容易损毁,不允许观众自由翻阅,这导致观众不能直观地了解史料的具体内容。为解决这个问题,展馆工作人员在编写说明词时,应重点阐述书中的主要内容,而不是简单地罗列书名、发表时间和出版方等信息。展览第二单元展出了《新中国向前迈进——东北旅行印象记》(图3)一书,陈列大纲初稿中给出的说明是:“1951年,宋庆龄撰写的视察东北的报告——《新中国向前迈进》。”除了出版日期外,其余信息均可从展品封面上获得,这样的说明文字显然不具有可读性。而实际上,此报告是宋庆龄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展视察工作的证明,报告为国家制定大政方针提供了依据,体现了宋庆龄作为国家重要领导人的职责与担当。因此,展馆工作人员在编写说明词时,应对报告内容稍做介绍,以方便观

众了解宋庆龄视察东北地区农业、工业、福利文化事业等行业后的感想。综合以上考虑,该报告的说明词最终改为:

1951年,宋庆龄撰写的视察东北的报告——《新中国向前迈进》。该报告列举大量事实与数据,讲述了东北城乡巨变。宋庆龄指出:“东北证明了新中国确实是在朝着它光辉的未来,向前迈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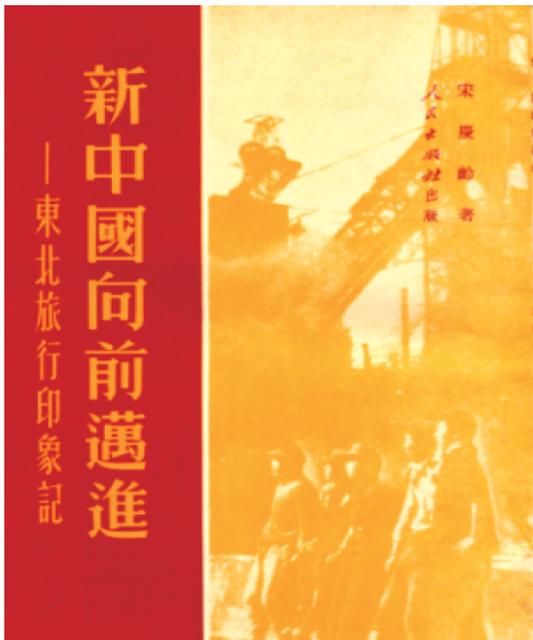


图3 宋庆龄的视察报告《新中国向前迈进——东北旅行印象记》

(三) 充分考虑展览的政治性

博物馆有着独特的政治传播功能,作为文化和教育机构,博物馆的文化职能在于保存特定社会群体的“集体记忆”并且维护他们的“文化身份认同”^②。它“作为一种大众媒介,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展示政治意图、传播政治信息的文化教育机构,是维系和支撑权力运作的空间载体”^③。展览以实物展品为基础,以学术研究为支撑,是博物馆面向社会公众输出的重要文化产品,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引导舆论的作用。近现代人物类展览因展览人物的特殊性,政治性更加明显。

展馆工作人员在编写展品说明文字的过程中,

① 上海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上海孙中山宋庆龄文物图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第126页。

② 刘宏宇:《呈现的真相和传达的策略:博物馆历史展览中的符号传播和媒介应用》,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第6页。

③ 刘燕:《博物馆的政治传播功能释读》,《东南文化》2018年第1期。

要注意语句的规范性,特别是与国体、政体、国家领导人、重大历史事件等相关的表述的规范性,如在编写过程中对某个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定性时,必须借鉴权威材料,切忌想当然。此外,展馆工作人员在编写展品说明文字时,还应尽量避免使用敏感或易引起歧义的词汇,如果无法确定某些词汇或语句是否触及敏感因素,最好在不影响文本内容的前提下对语句进行删减或修改。例如,“为新中国奋斗展”中展出了一张保卫中国同盟艺术团参加义演的照片,这张照片是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与其他工作人员的合影。为避免触及敏感因素,在不影响展品信息传递的基础上,展馆工作人员将这张照片的说明文字修改为“美国著名歌唱家保罗·罗伯逊”。

三、结语

“虽然博物馆的‘展览语言’以物为主,但明显除了以审美为目的的艺术品罗列展览,对大部分展

览来说,针对各类展品实物和相关信息而展开的自然语言表述也是不可缺少的环节。”^①展品说明文字是展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前言、结语、标题说明文字共同承担着叙述展览故事的职责,在所有版面文字中占有较大比例,直接影响着观众对展品、展览的理解与认识。所以在编写展览说明词的过程中要格外注意文字的准确性、可读性和政治性。

展览的内容策划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展馆工作人员在编写策划方案时,既要保证所述文字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又要兼顾展览的普及性和趣味性,工作难度较高。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说明文字的编写工作进行理论研究和探讨,这能为日后同类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有益借鉴。

由于时间和能力所限,本文只是以一次项目经历作为切入点,进行了浅层次分析。实际上,许多问题有待在未来的工作和研究中进一步探索,如某一类展览的展品说明文字是否存在普遍适用的编写思路、什么样的说明文字能在保证展览质量的同时引起观众的兴趣等。

^① 俞文君:《人物纪念馆展览内容设计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